

## 第四章 台北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與殖民

### 意識型態之文本分析

這一章的內容主要是透過文本分析對於台北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在社會裡所具有之社會意義的闡述和說明。也就是說，從台北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的教材本身，探討其與殖民意識型態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第一節的部份，主要先針對英語成為全世界重要的溝通媒介的這項事實加以描述，並藉此與台北市政府出版的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連接以便進行文本的整體性分析；接著，第二節主要是從語言的社會性特徵來敘述英語為何會成為全世界重要的溝通媒介，並且進一步地探討英語如何成為全世界重要的溝通媒介，並且能夠普遍的全世界各地蔓延開來。最後，則是透過之前對英語本身不斷擴張的過程的討論，進一步推演至論述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英語教材與殖民意識型態之間的複雜關係。

#### 第一節 英語普遍化與台灣成人基本教育之實踐

在現代社會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到處皆可看到英語的存在。例如，日常生活中使用到的電腦、電視、書籍等各類產品；在道路上顯而易見的路標與廣告；火車站、航空站等地方；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各類傳播媒體；金融業、商業、教育活動等等生活領域。我們可以發現，有些部份甚至全面依賴英語，如電腦工業。<sup>1</sup>

從一些數據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英語已經成為一種全世界共通、共享和共用的語言。在全世界 60 多億人口中，有 3.8 億人口的

---

<sup>1</sup> 美國輸出的微軟視窗(Microsoft Windows)作業軟體是明顯的例子。

母語或第一語言是英語，這些國家也就是英語系國家，主要包括如英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國家。而英語能佔有全球性的語言使用核心地位，並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國家將英語當成母語就可以了。英語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流通的重要因素是，英語廣大地受到非英語系國家的接受。目前世界上，英語已逐漸成為世界上七十幾個國家的官方語言。除此之外，即使在英語不具有官方地位的地區，英語也是被優先列為一個國家實施外語教學的語言。數據顯示大約有 2.5 億的人口其英語第二語言是英語，在這當中，中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另外，有超過一百個國家，選擇英語作為優先學習的外來語言，並且全世界有將近 10 億人正在學習英語，20 億人接觸英語。據預測，到 2050 年，世界一半人口的英語將達到熟練程度(姜磊，2002；Crystal, 2000)。

除了英語受到相當大量人口的使用的現象之外，另外令人驚奇的是英語驚人的傳播速度。在十六世紀末，世界上以英語作為母語的人口約有五百到七百萬，而且幾乎都居住在不列顛全島。到了 1952 年，這個數字卻暴增到 2.5 億，而且分佈的範圍多在英國以外的地區(Crystal, 2000)。五十年後，英語為世界語言的說法卻成為不容人們否定的事實。然而，英語在世界的優勢現象，也相對地導致其他國家的語言處於弱勢的狀態。因此，對於英語如此快速發展的現象是有必要加以探討，並從討論的過程中，發現為何英語與其他語言會存在不對稱的關係。

基本上，英語之所以能夠如此快速的在世界各地擴張，可以從歷史、文化、政治以及經濟上等因素來推敲。從政治面來說，無可諱言地，英語的快速發展是同十九世紀時，英國殖民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肆虐，推展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的帝國版圖以

及二十世紀美國的強盛這兩項因素，是有著直接以及深遠的關係。不過，從英語開始在幾個原屬其他殖民帝國領土的國家中受到重視的現象來說，那些國家並不是透過殖民統治的過程而與英語產生連結。例如前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其政府在 1996 年選擇英語作為其主要外語，取代了法語原本佔據的地位。

從經濟上來說，這是由於英語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佔據中心地位，並且透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各個非英語系國家為了能夠在世界經濟版圖中佔有一席之地，自然也想參與在英語世界的經濟市場的活動裡，而這也間接促成了英語的霸權現象。尤其在二十世紀中葉，在美國為首所主導的全球權力關係及架構下，英語更成為國際間政治、外交、商業活動等各種交流活動，諸如重要科技經貿學術會議、政治外交協商、政府書信往返、學術論文出版發表等活動之間的主要溝通語言。也因此，英語成為了不同國家之間的人民，在旅遊時或日常會話的溝通過程中，最被普遍使用的共通語言(張月珍，2001)。

至此，經由上述的討論直接反映在本文的主題--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我們可以清楚發現，英語如此地廣泛地被非英語系國家所使用的現象，當然也顯現在台灣的教育實踐過程裡。我們以成人教育教材為例，基本上，國內在推行成人基本教育時，主要是透過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作為教學進行時傳達知識主要工具。而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編製目標，乃是希望透過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使得失學的民眾能夠更適應於現代社會，不被社會所排除。因此教材的編製必定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存在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教材所要教的內容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各項知能與技能是存在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從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輯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內容來看，該教材內容分為三種內容：國語篇、英語篇與數學篇，這樣的分類則表現出一種內在的邏

輯--對於處於現代社會的人們來說，首先必須具備本國語文的閱讀能力，然後養成基本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以及基本的數理推演與數學演算的能力。

從英語在全世界的普遍程度來說，不難想見，英語能力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其扮演現在全世界普遍地以英語作為不同國家或族群之間彼此溝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工具的角色。即使是為失學民眾所編訂的教材，其目的仍然不僅侷限在對教導對象生活基本知識的傳遞，更進一步的，編纂教材的團體不得不順應時代的趨勢，將英語基本能力透過教材來實現。也許其出發點僅僅是單純的個人知識的累積，但在某種程度上卻也讓我們不的不承認，在全球化過程的迅速開展下，即使在本土化發聲如此響亮的同時，作為教育工具的教材仍不免感染到這股英語在全世界普遍化浪潮。

經由以上的論證，台灣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正可以作為一個窺視台灣本土化與殖民意識型態交錯的起點，尤其是在近年來台灣社會逐漸朝向一個不只是本土化，而是「台灣本土化」的意識型態前進。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本土化又如何能在英語全球化的範圍中掙脫，並尋找自身文化的新方向。這個問題在以下的章節將逐一分析並討論。

## 第二節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在語言學與文化霸權上之

### 深層意義

在討論英語做為推展西方文化霸權的工具這個現象之前，我們必須先從理論上弄清楚語言如何從語言學的角色過渡到做為意識型態統治工具的角色。

#### 壹、語言的社會性特徵與推展文化霸權的關係

西方國家之所以透過語言推展其社會文化的霸權工作，主要是因為語言的社會性特徵。也就是說，語言是從其社會文化中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符號(symbols)，符號是意義的載體(vehicle)，同時人們會透過符號與他人溝通。語言則是指符號的體系，這些符號體系是可以透過無限的方式組合起來，而且不僅能夠呈現出具體的對象(objects)，也包含了抽象的思維(abstract thought)。簡單來說，語言是一項人們與他人進行溝通抽象思維以及描述社會的基本方式。從這一點來說，語言對於所有的人類來說，則具有普遍性(universal)的意義；然而對於特定聲音或符號所賦予的意義就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了。因此，不同文化之間，對於同樣一個符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使用方法，甚至可能該符號在某些文化中完全不具有任何意義(Henslin,1993: 35)。也就是說，每種語言都是從其社會文化中所衍生出來的，不同的社會文化會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方式。

在羅蘭 巴特的符號學基礎上，符號是無法從其和人的關係的連結之中抽離出來，因為符號畢竟是人創造的。西方國家之所以透過語言的手段進行進行霸權工作，這是因為語言是同社會文化發生關係

的。人們對於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總是習以為常的，一旦英語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連結的話，人們對於英語的存在也會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西方國家要推展自己的社會文化至非英語系的國家的最佳途徑便是透過將語言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再者，由於語言是最普遍表達出人們身份認同的特徵。因此，人們遇到跟自己說相同語言的人們會有他鄉遇故知的情懷，這便是因為語言跟其社會文化的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

基本上，有關語言學與種族主義的關連性討論和當代後殖民論述是分不開的。後殖民狀態的概念主要是探討文化與權力問題。相對於政治解殖的特色是衝突性、是對抗模式的反殖、以及二元對立的立場；後殖民世界則較為流動，是一個開放的論述實踐領域。後殖民狀態重視的是大眾文化、後本土主義(混種文化)、以及流動的移民的部分。其作法是透過再現(representation)受殖者的記憶，而記憶在後殖民的研究裡跟語言有著莫大的關係，這也使得後殖民學者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上是採取一個語言分析的立場。

這種對語言的質疑，主要來自文學批評方面的方法啟發。對殖民統治意象的批判，常集中在文學和語言的角色上(西方世界具有文本的權威性，書寫文字比口語具有權威)，因此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對抗西方殖民主義首先是必須在文學和語言上取得寫作空間的，只有在語言上不受限制，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象上的自由。

民族主義可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已經不像已往只是要求一種在領土範圍上、在地域上和其他民族相區隔。當代民族主義的實現更重要的是擺脫佔統治地位的支配語言，因為語言是思想體系建立的起源，是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是人們一切活動之所以可能的後盾，所以要求得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就必須在語言上徹底排除統治語言的支配和

壓迫。

基本上，全世界逐漸普遍認同英語是一項共通的溝通工具的這種意識，首先應該被加以分析。為什麼英語這麼容易地被全世界所接受？而且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地，甚至是一種出於自願的意識接受英語是全世界流通的共同語言。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當代社會對英語的態度可以說是被創造出來的。這牽涉到的問題是，誰有能力創造這樣的英語神話並且傳播這樣的英語神話。顯而易見地，如果製造者或發出者的社會權力愈大，則愈能控制英語神話的創造與傳播。

換句話說，英語能夠如此地快速流通，其實同傳統歷史上西方國家對全世界的一直以來所佔有的主宰性是脫不了關係的。作為製造者或發出者角色的西方國家這種不停炒作的現象，就是進行「增殖」(proliferation)的工作。在這樣的狀態下，其他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即使有選擇是否使用英語的權利，卻也是一種被動的選擇，人們只能從這些現象中選擇，並不是自己創造選擇。從後殖民的觀點就可以發現，西方國家(發出者)其實正是透過各種管道，包括殖民統治、經濟全球化等手段，傳播它所創造出來的現實(reality)。換句話說，西方國家(殖民者)便是正在對非西方國家(被殖民者)進行英語霸權工作(圖 5-2)。

從西方國家這樣創造與傳播過程，來檢視台北市政府所出版的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部分，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就設計英語教材內容這一點來說，可以說是設計者毫無疑問地接納了殖民者所創造與傳播的事實，認為英語是目前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語言能力。反過來說，只有懂英語，才能適應於現代社會的這個意識型態正被隱蔽的建立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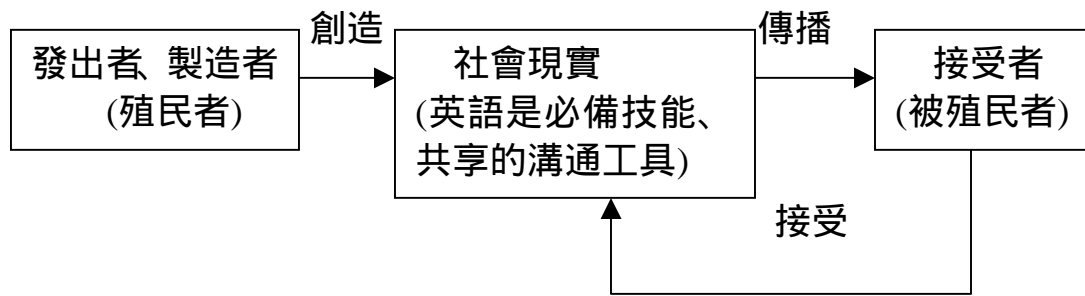


圖 4-2-1 英語如何成為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 貳、後殖民語境下的英語/英語教材的定位

如前述所說，殖民者不斷地創造與傳播英語作為一種符號，創造並宣傳英語所承載的意義是---一種在現今的社會中，甚至全世界中是必備的語言能力。而且由於語言是由社會文化中發展而成的，所以語言是西方國家推展文化霸權的重要工具。然而，在這個不斷利用語言的社會性特徵以及全球化的手段來進行增殖的工作中，教育是相當重要的轉傳機制。

這一點可以從殖民的過程來認識，也就是說，殖民的過程是指一個國家透過武力或涵化的手段控制另一個國家。這裡的涵化牽涉到的意義是被殖民者被強迫去遵從殖民者的文化傳統，因此，這個涵化的觀念在處理殖民教育的問題上是很重要的。殖民者認知到，如果僅從身體上的控制來進行殖民的工作並不是必然有效用的，必須從心理上的控制著手。心理上的控制就是透過重要的教育場所---學校教育系統。這種殖民的教育是可以影響被殖民者接收殖民者的社會文化，而且也並不會讓被殖民者將其所接納的殖民者的社會文化與本身既有的社會文化獨立分開(Southard, 1997)。

再者，由於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所謂的全球化現象。隨著全球化的蔓延，世界秩序正在重構。過去的生產方式是以具體的商品為主，而現在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儲存和服務方式為主。例如耐吉(Nike)的弧線標誌以及「Just do it！」這個標語(slogan)是相當熟悉的。麥當勞(McDonalds)的「M」這個圓弧形的標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特有的食物---漢堡。另外，可口可樂有幾則廣告，不以產品為主要訴求，而是以「慾望」作為產品的情感連結：一個「壯男」型送貨員到充滿女性員工的辦公司，為可樂販賣機補充罐裝可樂，女員工無不為之忘情，停下手邊的工作。這樣的廣告是以抽象的慾望煽動對可口可樂的情感連結。因此，可以說全球化的現象也促成了殖民者的社會文化以一種符號 象徵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蔓延。被殖民者不但是自願性的接受殖民者強加的符號意義，同時也將殖民者的社會文化納入自己的社會文化中，成為自己社會文化的一部份。

然而，要檢視這個不合理的現象---被殖民者將殖民者的社會文化融入自身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是可以從索緒爾的觀點來加以說明。索緒爾認為，在絕對的意義上，我們都不是我們的陳述的「作者」，也不是我們通過語言表達的意義的作者。我們只有通過把自己放置在我們的文化的語言規則與意義系統之中，才能用語言來生產意義。語言是一個社會的系統而不是個體的系統，也就是說，言說一種語言並不只是表達人們內在或創造性的思想，同時也激活大量已經存在的意義。因此語言是被建構的。而語言與身份的關係也很相似，每個人都是在與他者(other)的關係中才知道自己是誰。例如我是在母系(他者)的關係中知道我自己是誰(陶東風，1998)。因此，就如同語言一樣，身份永遠是被建構出來的一種象徵，它是取決於與具體的他者之間的

關係。

回到本文的研究焦點，在分析英語教材時不能單純地分析其教材內容，必須將其放置在與一個具體的他者之間的關係來討論。從教材分析的結果來看，教材內容裡面隱含了許多西方的文化要素，而且這些西方的文化習慣、產品中，有一部份是跟臺灣傳統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但是這些西方的文化習慣、產品卻已經成為廣泛地受到臺灣人民的接納。而且人們對於這些西方的文化內容不僅是習以為常，更是將其視為自己的生活、文化的一部份。

在這個不合理的現象之中，台北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更發揮了促成不合理現象繼續發展的作用。這種透過教育進行增殖的工作可以從台北市教育局編印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來加以說明。正由於臺灣社會/台北市政府普遍接受英語的世界性意涵，認同英語是現今社會的人們必須具備的語言能力，因此設置英語的課程做為成人基本教育內容的一部份。這樣的作法反而更強調了西方的文化價值，而且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的出現，可以說是一種被殖民者接受殖民者所創造出來的英語符號意義的最佳表現(圖 5-2-2)。另外，在分析英語教材時，發現教材內容中有以臺灣文化作為教材內容的一部份，這反映出後殖民論述中一直圍繞的「他者」的概念，他者是具有雙重性，同時包含認同以及差異性。每個他者都是在殖民文化的意義與價值中創造出來的，但同時也是被這些殖民文化排除在外的，甚至以這些殖民文化作為反抗的來源。

這就是說，在被殖民者不自覺地或自願性地將西方文化納入並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份時，殖民者卻又由於「民族中心」的優越感作祟，排斥非西方的文化價值，同時透過不斷塑造東方的形象，並透過全球化的手段，這種西方對東方的概念符號傳達到東方國家，國家在面對

這些符號概念時，有時是相當願意接受與認同的，但同時也將其作為反抗西方的來源。所以，這也就是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出版的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希望接受成人基本教育的學習者學習英語其實就等同於政府默許了統治者的支配地位，也使得臺灣人民混淆了對自己土地的認同。

總而言之，臺灣要真正擺脫統治者的支配語言，首先必須從教育的內容上著手。否則國家一旦在語言上受到主宰，對於自己的語言、文化的發展就相對地產生阻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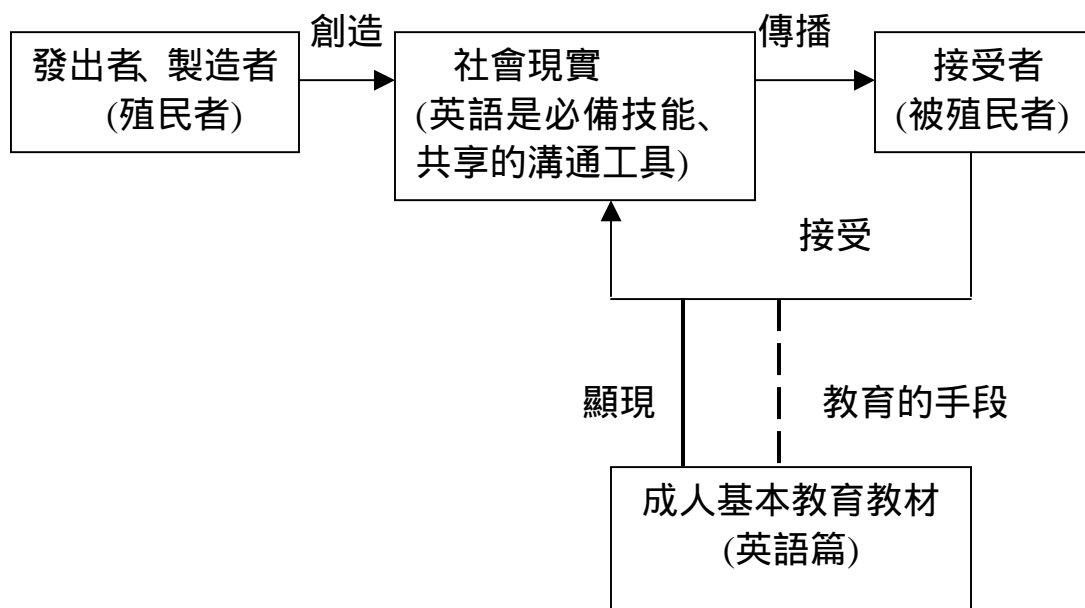


圖 4-2-2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與殖民的關係